

朱子讲历史之三：评伊川易传中的史例

张元

(台湾清华大学 历史研究所, 中国台湾 新竹)

[关键词]朱子讲历史, 伊川易传, 史例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0457-6241(2006)04-0062-02

最近读何炳棣写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台北:允晨, 2004), 觉得很有意思。这本历史学者的自传, 内容十分丰富, 其中关于专题研究的论述颇为深刻, 值得细读, 也可以学到很多。他在两处地方提到朱子, 也是备致推崇。一是谈及张载的《西铭》, 他引用朱子批注《西铭》之后的“论曰”, 接着说: “朱熹对《西铭》的了解远较无数《西铭》中、英文诠释者为深刻而正确。”二是说到《老子》与《孙子》之间辩证传承的关系, 他说: “不妨从朱熹最尖锐而不失中肯的观察入手。”再举出《朱子语类·老子》的“开卷语”, 加以引申, 他的结语是: “所以洞察力极强的朱熹独以最能代表兵家精髓的名句作为《老子》之体用……这是何等权威的思想核酸遗传‘基因’的鉴定!”何炳棣的意思是, 在证明《老子》出于《孙子》, 《孙》为《老》祖的推论过程中, 朱子的话极具启发性, 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朱子确实如同何炳棣所说, 观察尖锐中肯, 洞察力极强, 是一位思虑极精细敏锐的大学者。我想起了读《朱子语类·易经》时的一些印象, 其中他对程伊川的《易传》不无批评, 主要是说伊川讲得虽然很好, 但有的地方发挥太多, 有失圣人原意; 有的地方则思考不周, 有欠通顺。这里举一个讲历史的例子, 稍作说明。

《易经·遯卦》所言虽为“退避”, 并不是宣扬没有原则的消极“逃世”, 而是说明事务的发展受阻时, 必须暂行退避, 等待将来有一天能够有所作为, 再把道理加以宣扬。此卦的卦辞是: “亨, 小利贞。”彖辞是: “遯, 亨, 遯而亨也。刚当位而应, 与时行也。小利贞, 浸而长也。遯之时义大矣哉!”程伊川在《易传》中, 对“小利贞, 浸而长也。遯之时义大矣哉!”这几句话作了阐释, 大意是: 当阴暗的势力

逐渐发展的时候, 没法大有作为, 而强调还可以做点小事的原因, 在于阴暗势力一定是慢慢扩张, 未必能够立即强大, 君子可以做点合于道的小事, 让它不会立即消亡。遯是阴暗力量出现的开始, 君子有所知悉, 就要深以为戒。写此卦的圣人的意思是既不能立刻扼制, 所以说: 要随着时代趋势, 作点有益的好事。圣人和贤人, 既然知悉合于道理的事无法实现, 甚且还会消亡殆尽, 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而不设法有所挽回呢? 他们一定在情况还未极度恶化之前, 尽一己之力来对抗险恶的环境, 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成果, 减缓恶化的趋势, 这是孔子和孟子都会去做的事, 也是王允在汉末, 谢安在东晋所做的事。

程伊川以王允和谢安作为说明这个道理的历史例证, 朱子觉得不妥。朱子的看法见于《语类》卷七十二, 兹录于下:

伊川说“小利贞”云, 尚可以有为。阴已漫长, 如何可以有为? 所说王允谢安之于汉晋, 恐也不然。王允是算杀了董卓, 谢安是乘王敦(应为桓温)之老病, 皆是他衰微时节, 不是漫长之时也。兼他是大臣, 亦如何去! 此为下位有为之兆者, 则可以去。大臣任国安危, 君在与在, 君亡与亡, 如何去! 又曰: “王允不合尽杀梁州兵, 所以致败。”

朱子对于《易经·遯卦》的词句解释就有不同于伊川之处, 他不赞同伊川对“小利贞”的说法, 他在回答学生疑问时说: “若《程传》所云: 则于‘刚当位而应, 与时行也’之下, 当云‘止而健, 阴进而长, 故小利贞’。今但言‘小利贞, 浸而长也’, 而不言阴进而长, 则小指‘阴小’之‘小’可知。况当遯去之时, 事势已有不容正之者; 程说虽善。而有不通矣。”朱子的意思是, “小利贞”不宜解释为“应该做点合于道的小事”, 而是指“小人正是得意”而言。

【收稿日期】2005-11-05

不过,这条词句的解释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要谈的是历史例证的用法。

朱子认为阴暗险恶的势力既然已经滋长,君子就很难有所作为了。伊川所说的王允在汉末与谢安在东晋,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时代愈来愈阴暗,趋势愈来愈险恶,实际并非如此。王允杀董卓的时候,董卓的势力已经走下坡了;谢安所以能够抵挡住桓温,也是因为桓温已是体衰多病。王允和谢安之能有作为,是因为阴暗险恶势力的趋于衰微,而不是愈趋强盛。也就是说,朱子认为,伊川所举的历史例证是与《易经·遯卦》中所要阐释的道理是不相符的,经书讲的是阴暗险恶势力不断发展强盛,举的史例却是在阴暗险恶力量已趋于衰微之时,这样的例证是没有论证功用的。所以说,伊川的意思很好,但在经书的解释上却是说不通的。

我们读伊川的论述,大都觉得十分顺畅,对于王允、谢安在朝政衰危,大权旁落的时刻,表现出力抗权奸的心志,又有具体实际的做法,必然赞赏不已。我们固然可以说,汉末、东晋朝政之衰危,乃系董卓乱政,桓温谋篡,有以致之;但是,王允杀董卓与谢安抗桓温,并不是在董卓、桓温势力不断上升发展的时刻,也是十分明确的事。王允、谢安的表现应予肯定和赞扬,把他们的努力说成是在阴暗险恶势力趋于强盛的时候起而对抗,力挽狂澜,则明显有违史实。这个道理十分清楚,稍一讲述,无不晓然。只是在阅读伊川《易传》之时,立即指出这里的不妥,绝不是容易的事,没有极为精细的思虑,是难以做到的。

朱子为什么做到了呢?如果说朱子的思虑极为精细,那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朱子会如此细致?就这一件事来看,他何以能够立即看出一般读书人都会放过的不妥叙述?

我觉得朱子很重视历史,他对历史的本身有相当深刻的了解,这是与张载、程颐等理学家偶尔也谈谈历史,举举史例的情形很不一样。朱子可能会记错人物的名字,就像这一段话中,把桓温说成王敦;但他对于时代的情景,以及发展的趋势,却有极为清楚的了解与掌握。关于这一点,我在之前的两篇小文《朱子讲历史之一和之二》,都做了一点介绍,

· 新论摘编 ·

可以参看。

我们不妨进一步追问,朱子何以能够掌握历史的情景与趋势?我的揣测是应与朱子的读书方法有关。怎么说呢?朱子读书讲求“虚心”,就是展卷之时,心中不可存有杂念,而是力求理解书中的内容与义理。读历史也是如此,先要进入历史情境之中,设身处地,感受体会,对于过去的时代才能有真正的认识;有了真切的了解,才能作进一步的引证或讨论。

朱子重视历史的态度,不只见于读历史,就是读经书亦是如此。因为经书虽然是圣人所写,但也是历史产物,也要从历史的角度来了解。举例来说,《易经·益卦》的爻辞:“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程伊川在《易传》中的解说大意是:三是居于下体之上,就是在人民之上,指的是太守、郡令这些官员。这些官员居于人民之上,处于刚决有为之位,可以做一些事。果敢去做,遇到不平常的灾难艰困,奋不顾身,竭力庇佑人民,就必然没有咎害。朱子不同意这样的解说,朱子对学生说:

伊川说《易》亦有不分晓处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说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当时未见有这守令,恐难以此说。某谓“益之,用凶事”者,言人臣之益君甚难,必以危言鲠论恐动其君而益之。

这里可以看到朱子不同意伊川意见的很重要理由是,伊川解经没有回到经书出现的时代。这也反映了他自己的态度,经书中的圣人言说,需要回到上古圣人的时代去理解。也许,这可以说是朱子解经兼重历史,程子解经唯重哲理的一个小例子。

朱子重视历史,读史之时,既专心又细心,理解深刻,体会真切。我们学习历史,应该以朱子为榜样,不带任何成见地进入过去的时代,仔细观察,悉心体会,对于时代的情景与发展的趋势,相信都能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作者简介】张元(1941—),男,河北广宗人,中国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宋史及历史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蔡世华

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

统一新罗并合了朝鲜半岛上旧属三韩的地域,没有也无意于北上占据本非三韩的高句丽故地。有唐一代,辽东即鸭绿江南北的高句丽故地主体仍然属于中原王朝,渤海国仅据有一部分高句丽旧地。所谓“统一新罗与渤海国的相互敌对很像一个被分割国家的南北两部分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对历史的误解。

(原载《史学集刊》长春,2005(3) 作者王小甫)